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简明中国近代史/曹立前编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8

ISBN 7-5333-1710-6

I. 简... II. 曹... III. 中国—近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4207 号

## 简明中国近代史

曹立前 编著

---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mailto: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31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710-6/K·534  
定 价 18.00 元

---

# 第一章 鸦片战争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 一、战前的国内外形势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之下。清朝开国之初,曾经有过一百多年的鼎盛时期。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权益,抵抗列强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陆上的西方殖民扩张。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清朝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在社会经济中,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根据嘉庆年间的统计,直接或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就多达83万顷。乾隆、嘉庆时期的大学士和珅占地八千余顷,道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两万五千余顷。其他贵族、官僚和地主也都占有为数众多的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使大批中小土地占有者失去生产资料,从而大大加强了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1796年,爆发白莲教大起义,势力遍及鄂、川、豫、

陕、甘五省，参加民众数十万，绵延近十年。1813年，爆发天理教起义，影响波及豫、鲁、冀等省。其中，由林清率领的一支二百多人的起义队伍，在宫内太监的协助下，曾一度攻入北京紫禁城内，极大地震动了清朝统治者。

与此同时，清朝的统治力量也因为政治腐败和财政危机而受到极大的削弱。官僚机构膨胀，吏治黑暗，各级官吏贪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乾隆时期，控制朝政长达二十多年的权臣和珅，利用各种非法手段疯狂聚敛财富，总数高达四亿两之巨，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八年的财政总收入。各级地方官吏也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就是对当时吏治败坏、无官不贪现象的生动写照。普遍的贪污腐化现象不仅严重地削弱了清政府的政治统治，而且也影响到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田赋、漕粮、盐课、关税等。清朝初期，在财政方面尚有相当大的盈余，但到嘉庆、道光时期，财政危机开始出现。一方面，军费、官僚贵族的俸禄等开支日趋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吏的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漕运、盐政、河工成为病民扰民的弊政，严重地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到鸦片战争以前，随着大量白银的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实际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增加赋税，从而更加重了民众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鸦片战争前，清朝拥有约20万八旗兵和60万绿营兵，总兵力达80万，但缺额甚多。当时，清军使用的主要武器仍然是刀矛弓箭等传统的冷兵器，仅有少量军队装备有滑膛火绳枪和火炮，不仅武器落后，而且极度腐朽，营务废弛，军纪荡然。军官吃空额，克扣、冒领兵饷，敲诈勒索；士兵不事操练，许多人竟然吸

食鸦片，聚开赌场。国防力量也变得十分虚弱。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和消弭汉族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入关之日起，就采取了怀柔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封建士大夫噤若寒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思想界和学术界万马齐喑，死气沉沉。道光时期大学士曹振镛曾向他的门生传授做官的诀窍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在政治文化的高压专制下，封建士大夫愚昧、麻木、苟且、无耻，已经失去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清朝统治的衰败表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快要走到了它的尽头。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欧美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并且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进行扩张。

英国资产阶级于 17 世纪取得政权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 世纪中叶，又开始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工场手工业逐渐为机器工业所代替，出现了大量的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工厂。进入 19 世纪以后，机器工业更是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从 1770 年到 1841 年的 70 年间，英国棉织业的用棉量猛增了 100 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其他工业的产量也迅速增加。其海陆军也都装备了新式武器。这一切，就使英国变成了一个走遍世界寻求殖民地的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它的棉纺织品产量从 1815 年到 1840 年间增长了 3 倍，煤铁产量也有了很大的增长。

美国的工业发展比较晚,但是,1783年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很快,其农业机器的生产数量迅速超过欧洲各国。到1850年,美国的铁路总长度达到15000公里,位居世界第一。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因此,落后的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便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和掠夺的对象。

## 二、闭关政策与鸦片走私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所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中国的手已经不再是古代的“蛮夷之邦”,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另一方面,统治中国的是腐朽、专制、已经趋向没落的封建王朝。东西方之间的新格局,预示着近代中华民族命运的坎坷。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却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仍然实行清初开始制定的闭关政策。

所谓闭关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严格管制对外贸易的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将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公行制度,由清政府认可的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以限制外商的交易对象;制定一系列管理、防范外国人的章程,对外商在中国的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清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尽管最初具有防范郑成功等领导的反清斗争的目的,但决非历史的偶然。在经济上,它是封闭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自然经济满足于自给自足,缺乏扩大对外贸易的观念和动力。

在政治上,它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民族狭隘性。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海禁”、“闭关”来防止汉人内外联结,形成反清力量。在文化上,闭关政策反映的是盲目自大的传统“夷夏观”,它使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排拒外来事物,使中国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

随着西方殖民者对华侵略的逐渐加强,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开始具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卫作用。但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对抗中,闭关政策暴露出了其严重的封建性和落后性,极大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越拉越大。对此,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sup>①</sup>

商品输出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殖民扩张的敲门砖,但在鸦片战争以前,这块敲门砖在中国并未能发生效力。一方面,清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对进出口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以其不假外求的天性,对外来商品进行着顽强的抵抗。以鸦片战争前对华贸易占居首位的英国为例,虽然其输入中国的棉毛制品品质优价廉,但却极少有人问津。而与西方工业品在中国备受冷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出口英国的商品诸如生丝、茶叶等却极为畅销。因此,在正常的中英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地位。1781年至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1790 年间,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高达 9600 万元。而在 1781 年至 1793 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工业品仅 1600 万元,只及茶叶价格的 1/6。为了弥补贸易上的巨大逆差,英国每年不得不向中国输送几百万银元。19 世纪,从广州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约在 100 万至 400 万两之间。一直到 19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每年仍然保持在二三百两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对华贸易上的劣势,掠夺中国的财富,牟取暴利,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试图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市场的手段。

鸦片俗称“大烟”,由罂粟的液汁提炼而成,原产于南欧及小亚西亚,后传至阿拉伯、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地。鸦片最初被人们所接受是作为一种口服的药材,具有强烈的麻醉功能和较好的止痛、止咳等功效。唐朝时期,我国曾经作为药材从阿拉伯输入少量鸦片。明末,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由于其强烈的麻醉性,一旦成瘾则难以戒绝,甚至危害健康和生命。16 世纪,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首先从海外贩卖鸦片到中国,但输入量不大,1729 年以前,每年约 200 箱。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开始向中国贩运鸦片。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印度鸦片的主要产地孟加拉,开始竭力发展对华鸦片贸易。1873 年,英印殖民政府确立了鸦片侵华政策,印度公司取得了鸦片专卖权,不久又获得了鸦片的制造权。这样,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从罂粟种植到加工制造鸦片、直至在加尔各答市场公开拍卖给走私商人的整个过程。在东印度公司的蓄意经营下,通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逐年增加。1773 年以前,每年不超过 1000 箱(每箱 100 斤或 120 斤),1800 年以后逐年增加,1828 年达到 11154 箱。1834 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对华贸易完全转到英

国私人企业手里。从此,英国鸦片贩子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更加猖狂地向中国偷运鸦片,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急剧攀升。1838年至1839年,每年平均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35500箱。

除英国之外,美、俄等国也先后向中国输入了一定数量的鸦片。据不完全统计,外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前的40年间,向中国走私鸦片多达42.7万箱,总价值在3亿元以上。

鸦片是一种昂贵而又使人堕落的毒品,罪恶的鸦片走私给殖民者带去的是暴利,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却是无比严重的危害。

第一,鸦片走私改变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地位,使白银大量外流,人民负担加重。鸦片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大量输入中国,打破了中英贸易的原有格局,中国开始由出超变为入超,并导致白银的大量外流。据统计,在1821年至1840年间,中国外流的白银至少在1亿两以上。鸦片战争前夕,情况更加严重,保守的估计,每年外流的白银至少也有1000万两。白银外流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一是造成银贵钱贱。1794年,一两白银值铜钱1000文;到1838年,则值1600文至1700文。二是无形中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平时出卖劳动力所换回的是铜钱,而清政府规定交纳各种赋税必须折成白银,银钱比价增大,等于使农民和手工业者实际上要多负担60%~70%的赋税。三是由于银价上涨,各省拖欠的赋税日益增多,致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

第二,鸦片的大量泛滥,中国社会有限的购买力大量被鸦片吸收,造成了城乡工商业的凋敝,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封建的中国本来就缺乏发展工商业的条件,鸦片贸易又大量吸纳了人们对一般商品的购买力,致使商业普遍萧条和衰落,使本

已停滞的社会经济急剧衰败。

第三,腐蚀了清王朝的官僚机构,加重了政治上的腐败。由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鸦片输入,鸦片走私只能通过武装偷运或贿赂地方官员的方式来实现,因而鸦片的泛滥正是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sup>①</sup>

第四,摧残了中国人的心灵和肌体,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鸦片久食上瘾,会逐渐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形同废人乃至死亡,对人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当时,吸食鸦片的阶层极其广泛,从贵族、官僚、书吏到一般百姓,甚至和尚、道士、宫廷太监,皆不乏手握烟枪、吞云吐雾者。根据 1835 年的调查,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约有 200 万人。如此芸芸众生遭受烟毒的侵蚀,其对国民素质的影响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可以想见的。

总之,烟毒的泛滥,引起了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何对待鸦片?怎样处置走私?无可回避地摆在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 第二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

### 一、正义的禁烟斗争

对于鸦片问题,清政府很早就采取了禁止的态度,但时禁时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早在 1729 年,清廷就颁布了第一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26 页。

道禁烟诏令。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也都曾多次颁布过鸦片禁令,但均遭鸦片走私者的破坏以及腐败官吏的粉饰欺蒙,致使有关规定形同虚设,最终导致鸦片问题积重难返。

鸦片泛滥,受害最深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他们坚决要求禁烟。在人民群众自发的禁烟浪潮的推动下,面对鸦片泛滥给封建统治造成的巨大威胁和压力,19世纪30年代,清政府围绕鸦片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朝廷,认为自嘉庆朝以来,惩办吸食鸦片的刑法日渐加重,但吸食者却越来越多,而且,朝廷禁令只会被胥吏作为牟利的工具,“法愈峻则胥役之徒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因此,他建议取消鸦片禁令,允许公开买卖。许乃济的主张代表了弛禁派的观点,得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等人的支持。

在弛禁派的喧嚣声中,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皇帝,痛陈鸦片的严重危害,主张实行严禁政策。他认为,过去鸦片屡禁不止,根源在于官吏贪赃枉法,致使禁令成为具文,建议改变方式,用“重治吸食”的办法替代查禁走私,限吸食者一年为期戒绝,逾期未戒者,平民处以极刑,官更加等治罪,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如此严刑峻法,则吸食者绝,鸦片走私不禁而禁。道光皇帝命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就黄爵滋的严禁主张复议上奏,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等在复奏中明确表示支持。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1811年中进士,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河道总督、巡抚,以干练廉明著称,民间素有“林青天”之誉。林则徐提倡经世之学,主张严禁鸦片,在湖广总督任内,厉行禁烟,卓有成效。1838年

7月和9月,他接连两次上奏道光皇帝,极力支持黄爵滋的严禁主张,认为欲根绝鸦片烟毒,非严刑峻法难以奏效。在9月的奏折中,他痛切指出:鸦片问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sup>①</sup>道光皇帝阅后,大为震动,诏令林则徐进京陛见,并于1838年12月31日命其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驰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接受任命后,于1839年3月抵达广州。到达广州之后,林则徐首先发布告示,向中外人士宣告,他此行专为禁烟而来,“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表示了根绝鸦片烟毒的决心。同时,在主张禁烟的广州官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的禁烟措施。

第一,注意查看民情,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禁烟热情。广州作为当时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深受殖民势力的骚扰和烟毒的危害,人民群众反对鸦片走私的情绪和禁烟的要求异常强烈。对此,林则徐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禁烟热情,调查和收集鸦片走私和鸦片贩子的情况,为禁烟的成功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第二,收缴外国鸦片贩子的烟土,并重治吸食之徒。根据广州鸦片走私和吸食的有关情况,林则徐制定出“将已来之鸦片,速缴到官,未来之烟土,具结示断”的禁烟方针,责令外国烟贩将趸船上所存鸦片一律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中英文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对违犯上述规定的鸦片贩子,则一律实行镇压。

---

<sup>①</sup> 《林则徐集》(奏稿),第601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与此同时，林则徐限令内地吸食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缴吸烟用具。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的有力配合下，收缴烟土烟具的工作卓有成效。据统计，至 1839 年 5 月 12 日，广东共捕获烟贩 1600 名，缴获鸦片 461500 两，烟枪 2700 多枝，烟锅 300 多口。

第三，严惩破坏禁烟的侵略分子。为了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一面指使被林则徐传讯的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一面挑唆外商拒绝具结和上交烟土。对此，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并派兵包围商馆，撤退中国雇员，断绝趸船与商馆之间的交通。义律企图阻挠禁烟的阴谋破产，英美鸦片贩子最后不得不缴出所有鸦片。

第四，销毁所有收缴的鸦片。1839 年 6 月 3 日至 6 月 25 日，林则徐于虎门海滩将所有收缴的鸦片焚销净尽。其销烟的方法是：在海滩高处，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大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海水灌入池中，而后将鸦片投入，浸泡半日，再将生石灰抛入池中，使鸦片在沸腾的海水中自燃。至退潮时，再开启涵洞，被焚毁的鸦片随潮流冲入大海。虎门销烟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的基本政策是：“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虎门销烟后，林则徐当即宣布开放中英正常贸易。尽管如此，侵略者仍然蓄意扩大事态，恶化中英关系，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并不断向中国水师进行挑衅。对此，林则徐在禁烟的同时，也采取了积极的备战措施。

首先，加强防御力量。林则徐初到广州，原以为凭借正义的力量和严厉的措施，就可以禁绝鸦片。但几经较量，他发现在鸦片的背后还有更为可怕的东西，也就是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

和勃勃野心。为防患于未然，林则徐下令增修虎门炮台，加固虎门海口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最狭处设置的木排铁链，购置或仿制西洋大炮。与此同时，林则徐又会同关天培等人，加强对水陆官兵的训练，以提高其作战能力。

其次，广泛发动群众。林则徐深受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影响，相信“民心可用”。他招募渔民、棚户丁壮 5000 人，编为水勇，授以火船，精练夜袭火攻之法。并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再次，注意了解国外情势。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人们对西方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不仅皇帝、大臣们对国外情况茫然无知，即使是身处广州的封疆大吏也未注意经常来往于此的外国人的情形。林则徐初到广州时，对国外情势的认识和了解并不比其他文武大臣高明，但他很快便敏锐地觉察出与其打交道的侵略者有别于自己以往对蛮夷的印象。于是，在举世蒙昧混沌之中，林则徐最先睁开眼睛，开始探寻外面的世界。他组织专人翻译外国的书籍和报纸，编成《四洲志》草稿，经常向能够接触到的境外之人了解各种情况。对国外情势的了解和研究，使他逐渐产生了合乎实际的战略思想，例如，不把中外正常贸易和鸦片走私混为一谈，能将当时的主要侵略者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对待，以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懂得学习敌人的“长技”等等。

## 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鸦片贸易为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惊人的暴利。1813 年，每箱成本为 237 卢比的鸦片，在印度市场的拍卖价是 2428 卢比，

利润高达9倍。许多鸦片贩子以此暴富,并得以加官晋爵。英印政府也从鸦片税收中获得了大宗的财政收入。中国一旦禁烟成功,势必会掐断这些鸦片贩子和英印政府的滚滚财源。因此,当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和销毁鸦片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就立即引起了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鸦片贸易集团一片战争喧嚣。他们竞相致书英国政府,要求“采取断然的处置,强有力的手段”,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sup>①</sup>

中国的禁烟运动,成了英国资产阶级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

1839年9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召见逃回英国的鸦片贩子查顿等人,商讨和拟定战争计划,其中包括所派侵华舰艇的数量、陆军人数及必要的运输船只等具体内容。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武装侵略中国的问题,做出了“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作为同清政府交涉的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支付军费案,决定派兵侵略中国。6月,由16艘兵船、4艘武装汽船、28艘运输船、4000余名士兵、540门大炮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开普敦等地到达中国广东海面,战争正式开始。

第一次鸦片战争从1840年6月开始,到1842年8月结束,共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1月下旬清

---

<sup>①</sup> 中国史学会编:《鸦片战争》第2册,第63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政府对英宣战之前,历时7个月。

在这一阶段中,英军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封锁珠江口,试图进占广东,但因广东防守严密,未能如愿。而后,英军依照其政府训令,留下少量船只封锁广东,其余大部分北上进犯。北犯英军进攻厦门受挫之后,7月攻陷浙江定海,8月初到达天津白河口,递交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本来,从全局来看,以中国之大,定海一地的得失并不会导致中国的战败,然而,虚骄的清政府却因此张皇失措。妥协派乘机抬头,攻击林则徐禁烟行为过激、措施失当。这种谣言深深的影响了本来就不具备抗战到底决心和勇气的道光皇帝,他一面下令对林则徐等人进行查办,一面采取所谓的“羁縻”政策,派直隶总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在得到琦善的满意答复后,英军于9月中旬暂退广州。

9月17日,道光皇帝任命“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以“办理不善”的罪名予以革职。受命赴广东与英军交涉的琦善,抵达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以解除自己的武装来取悦英国侵略者,致使英军气焰更加嚣张。1841年1月,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清军副将陈连升、陈举鹏父子以及土家族、苗族等守台官兵600余人全部壮烈殉国,炮台失守。此时懿律已因病回国,由义律接任全权代表。义律向琦善提出了所谓的《穿鼻草约》,并于1月20日单方面予以公布,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以及恢复广州通商等。1月25日,英军占领香港岛,并与琦善谈判签订《穿鼻草约》事宜,但此时琦善自感处境不妙,未敢再谈签约之事,谈判终止。

第二阶段,从 1841 年 7 月 27 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 1841 年 5 月 27 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

琦善等人的妥协活动,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极大不满。1840 年底,浙江定海的士绅、渔民、船户和商人散发传单,反对撤兵,要求抵抗。一些读书士子也投书官府,要求收复定海。广州人民则强烈反对割让香港,许多正直的官员皆上书要求罢免琦善、重新启用林则徐和邓廷桢抗战。面对朝野内外激烈的抵抗情绪,特别是在 1 月 27 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皇帝在盛怒之下,下诏对英宣战。随后,将琦善革职拿问,以祁项为两广总督,并谕令裕谦赴浙江取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同时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 17000 人开赴广东。

然而,道光皇帝虽然一怒宣战,却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实际有效的抵抗措施。奉命奔赴广州主持军事的奕山、杨芳等人昏庸无能,遇敌即溃,虽有关天培等少数官兵的英勇抵抗,却不能扭转被动失败的局面。虎门沦陷、广州被围。奕山向侵略者屈膝求和,与英军签订了《广州和约》,内容主要包括向英军交付广州赎城费 600 万元、商馆损失费 30 万元、清军退出广州城等条款。战争的第二阶段结束。

第三阶段,从 1841 年 8 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至 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1841 年 4 月,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远没有达到此次侵华的目的,于是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并增派援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1841 年 8 月,璞鼎查率军袭击厦门,9 月底再犯定海。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率五千守军浴血奋战六天六夜,全部

壮烈殉国，定海再次陷落。接着，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誓死抵抗，但扼守城外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英军缘梯登城，总兵谢朝恩战死，裕谦力战不支，投水自尽，镇海陷落。10月13日，宁波也被英军攻占。

浙东半月时间连失三城，清政府极为惶恐。道光皇帝为挽回败局，再次大举调兵遣将，赶赴前线御敌。11月18日，以协办大学士、宗室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征调各省军队近2万人，赶赴浙东。

奕经和奕山、杨芳等人一样昏庸荒唐。离京之后，奕经等人一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四个月才到达前线。接着，奕经便未在作任何认真筹划的情况下，仓促出击，分兵三路收复定海、镇海和宁波三城，希冀侥幸取胜，邀功请赏，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又丢失了慈溪。奕经仓皇逃回杭州，自此再也不敢言战，力主求和。

浙东战役的连续失利，使道光皇帝彻底丧失了抵抗的信心，从此一意主和。1842年4月，他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与伊里布一起到浙江向英国侵略者乞和。但是，英国侵略者认为此时尚未达到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的时机，拒绝和谈，继续大举进犯长江中下游地区。5月，英军攻占海防重镇乍浦。6月16日进攻长江口的门户吴淞口，守将江南提督陈化成壮烈殉国。上海、宝山相继失守。英军沿长江继续西犯，7月21日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指挥驻防旗兵1500人，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战死，镇江失守。

8月上旬，英国舰队兵临南京城下，道光皇帝失魂落魄，密谕耆英加紧求和。8月29日，耆英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按照英国提出的全部侵